

鄧喬彬學術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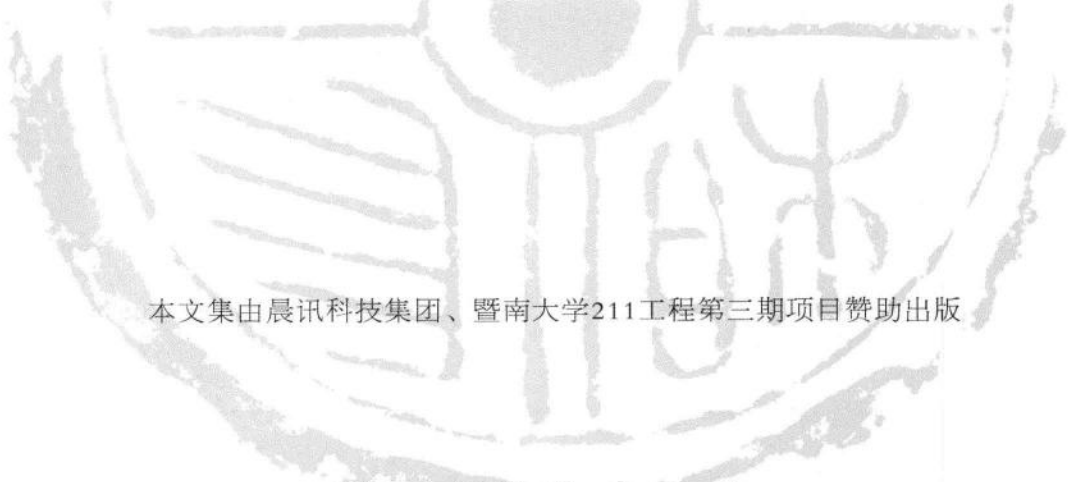
第五卷

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下）

邓乔彬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集由晨讯科技集团、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赞助出版

鄧喬彬學術文集

第五卷

唐宋词艺术发展史 (下)

邓乔彬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安 祝凤霞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下/邓乔彬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邓乔彬学术文集;5)

ISBN 978-7-5676-0147-5

I. ①唐… II. ①邓 III. ①唐宋词—词曲史—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0302号

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下

邓乔彬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l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6.75 插 页:4

字 数:583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147-5

定 价:53.00元(平装) 63.00元(精装)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今年七十周岁，应以之对照反省并思考其中原因了。

孔子以六艺授徒，实行全才式教育，我于1956年考入华东师大附中，勉强可算“十有五而志于学”，却已开始偏科。试前突击可考数、理、化优良，日常所好却为文哲、史地与艺术。高中再入师大附中，不久就被调到区体校，虽安排就读于同是名校的复兴中学，兴趣使然，偏科更为严重。直到高三，情况始变：体校为兼顾运动会得分和高考录取率，全班仅剩十七人，在最小的教室上课，一流老师讲课，我虽近视未戴眼镜，仍看得清又听得明，能集中思想学习。我不仅是文、史课代表，空间解析几何、有机化学等课程的测验、考试也几为全优。学业之进，使我误以为自己能做到文理兼长，因看到了历年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适思想、对诸多文艺现象和人物的批判，深感“文科危险”，于是，在高考的选择上，决定报考理工科。我有绘画之长，又爱制作船模，原欲报考同济大学建筑系或上海交大造船系，后来却突然生变。原因是：在六月举行的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体校组比赛中，我获得跳高冠军和三项全能亚军，被观战的华东师大体育老师相中，劝我报考师大。他告以师大物理系毕业生多分配至高校或科研单位，到中学的仅百分之五。而因经济困难，我曾对父母许诺读大学不要家里负担，师范生由国家提供膳食，能不爽所约，故而听从所劝，改以华东师大物理系为第一志愿，并被录取。

入学后，开始还信心满满，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尤其是高等数学，常布置几十道题，有时竟然半天也解不了一题，使我深感烦恼。有次实验，一女同学失手损坏了仪器配件，被命赔偿，她的痛哭使我难以平静，就此视实验为畏途。我住在运动员宿舍，见文科生毫无作业、实验负担，同室一位羽毛球队员读中文系，是印尼归侨，曾说：“我们的同学真厉害，高中就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听此叹慕，我心中暗笑：“这些小说，鄙人小学时就读过了，岂

止读过，人物和情节都能随口说出！”我深感文理科的苦乐不同，心想：“毕业后拿一样的工资，何必要读物理系？学得如此之苦！”为此，因高考弃长取短、选择了理科而后悔，开始有转系之念。

那时的高校，转系极难。我先向物理系提出转读中文系的申请，未得理睬。后听说，有一数学系转中文系的学生，曾向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信，历尽周折才得批准，且必须从一年级读起。我当然不愿去中文系“留级”，更不愿在物理系勉强升级，决定破釜沉舟、“舍命”一搏。于是，所有的专业课都亮起“红灯”，以证我不宜在物理系学习；同时，正式提出转读中文系二年级的申请。在受阻于物理系、教务处之后，我决定写信给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申明要求转系的理由。常溪萍抗战时入党，曾是山东的模范专员，保持老八路本色，经常出现在学生宿舍、食堂和运动场，爱打篮球，曾多次看我跳高，认识我。我刚入学，就在新生运动会上破了校纪录。1963年参加高校运动会，所有高度都一次过杆，最有希望夺冠，却在跳1米86时，心想过此高度将集冠军、高校纪录和一级运动员于一身，杂念一生，三跳失败，仅获亚军。虽如此，我仍是华东师大田径队的“希望之星”。我候在丽娃河桥畔，见他经过，把信交他手上，只说：“常校长，这是我要求转系的信。”转身就走。不久，教务处约我谈话，认真听取我要求转系的理由，后又同意我参加中文系考试，以决定能否转读二年级。事后得知，这是奉常校长所命而办，而常校长之所以同意我转系，主要不在于我是学校的优秀运动员，而是通过查阅高考作文卷，知我所写《雨后》一文似是得了理科生的最高分，这是可以转读中文系的重要理由和依据。

因期末考试已过，我被安排参加中文系一年级的补考，所有课程都通过，优多良少，我终于没成为“留级生”，在1963年下半年转到中文系二年级就读。这年冬天，成为一级运动员，自感学习上驾轻就熟，大有余力读书。次年春，我以1米92打破1米86的上海高校跳高纪录，距新的运动健将标准仅3厘米，是全校最有希望成为健将的人选。我开始酝酿学习与体育双优的计划，期待毕业能留校工作，走上高校教学和文学研究的道路。

但是，在中文系仅读了一年，1964年10月，全年级同学就被命参加“社教”工作队，到安徽农村搞“四清”。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后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全椒县到定远县，先后参加了三期运动。1966年5月，结束“社教”，恢复了大学生身份，

回到学校。但随即“五一六”通知下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拉开序幕，我在无“学”、不“学”的大学度过了“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两年多。好不容易在被拖一年后，于1968年毕业分配。五年制的大学六年毕业，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物理系，一年中文系，在“四面向”（厂矿、农村、基层、边疆）的潮流中，被分到甘肃永登水泥厂。服从建材部安排，我于1968年9月到江苏南通长江边的东方红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战天斗地，劳动一年半，于1970年3月结束锻炼。5月初到甘肃永登水泥厂报到，开始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接受工人阶级的永久性再教育。

我先被安排随政工组挖防空洞，后到原料车间，每天推小车，数月后，再被分到班组，当了三班倒工人。一年多后，职工子弟小学一位体育教师调回老家，厂政工组找我谈话，令去学校顶缺，理由是我不久前获兰州市首届运动会跳高冠军，教体育很合适。我认为自己虽能当专业教练却教不了小学体育，在压力之下还是顺从了。每天面对小麻雀般的一二年级小学生，和“我们今天玩什么”的发问，我只能摇头苦笑，唯求不出意外，何有教学可言！一年后，我改任职工子弟中学的军体课，课余还曾满怀热忱训练学生田径队。后被同事告知：校长对我教体育穿运动鞋和运动服、戴太阳帽（均自费购置）很不满，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差点过不了转正一关。在教了近两年军体课后，我“归队”当语文教师，而因“阶级”的嫌疑，冷却了对学校体育事业的热心。

很快就到了“而立”之年。难出于时代之外，此时的我是不“学”又未“立”。应付每周十二节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每周三个晚上的学习毛选、马列，是极其容易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不必“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此时除了马列、毛选，实在无书可读，我仅是利用为厂文艺宣传队创作节目的机会，借口找参考书，在厂图书馆发现了几本藏在角落的外国小说，读了以前未读过的梅里美《嘉尔曼》、《高龙巴》等书。

黄土高原的杨树叶生生落落，我的生活在“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中循环……终于到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先后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不久，传来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欢庆之后，很快就是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终于，在1977年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不久又传来研究生招生的消息。“伤痕文学”的出现，促使人们反思“文革”，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更鼓舞了许

多人,“志于学”的时代终于来临了!我在1978年春报考了古代文学研究生,以母校华东师大为第一志愿,在永登县城参加考试,除俄语外,其他三门课自感较好。在等待中得到了复试通知,却因夏天的洪水冲断宝天铁路,只能向厂领导申请乘飞机回沪,且不顾只准飞兰州到西安的批示而直飞上海,参加复试。9月,收到录取通知,我成为了“文革”后“黄埔一期”研究生,得以从中年开始“志于学”。

三年研究生,是我真正的读书期。深感本科六年、毕业十年的无学,蹉跎岁月之痛,激起了学习的热情。我尽废以前所好,停止了体育锻炼,渐入学术之门。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既是我学术研究的继续,又是逐渐开拓的起始。很快就进入“不惑”之年,对于人生之途自无所“惑”,而对学术问题则“惑”者甚多,因之而兴趣渐广。我先是为写研究吴梅的硕士论文而用力于戏曲和曲论,后因兴趣主要在词而转向唐宋词与词学批评,以上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分别是《吴梅研究》与《唐宋词美学》二书及参撰的《中国词学批评史》,还有多篇词学论文。而因唐宋词与词学批评分别被同事设为选修课,且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我就避之而将研究转到了古代诗画比较。这一转向并非有意作跨界研究,而是或因我青年时对诗画皆有所好的“情结”所致,此时因浸淫学术而多了几分中年的理性,虽未能用力于诗画创作,却对研究二者尤其是比较其异同感兴趣。遂从钱锺书先生的两篇论文及所提出的问题出发,写出了古代诗画比较的讲稿,以此稿开了多年的选修课,并据此而写成、出版了《有声画与无声诗》一书。此书被一书评称为“中国的《拉奥孔》”,虽或过誉,但也确是点出了构建中国古代诗画比较理论体系,揭示民族特色的意旨。

《吴梅研究》初稿成于1981年,出版于1990年底,历时近十年;《有声画与无声诗》成稿五年后,才于1993年出版。《唐宋词美学》1993年出版,《中国词学批评史》1994年出版。以上四种著作,都出在五十岁左右。而因前两者的出版历尽艰难,使我真正懂得学术研究成果的面世受制于市场,这就改变了以前的观念,大概可算是我的“五十而知天命”了!

虽然上述的专著、合著都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却是我八十年代“学”之所成,所以这十年之所“治”,主要是词曲与诗画之学。

1988年起,我受命参与华东师大文科第一个复合型硕士专业的筹建,开始指导这一名为“中国文化建设”方向的硕士生,又有授课的任务,

遂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文化学、文化史著作，结合我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写成《中国文化与文艺》讲稿。除了为这一方向的硕士生授课外，又在中文系各层次、范围的学生中以选修课讲过多次。在讲述十年后，写成《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一书，作为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成果，在2003年出版。在研读文化学、文化史的过程中，我一度对图腾、民俗颇感兴趣，曾费时费力地借助放大镜阅读影印版《二十五史》，企图从古史记载中寻找图腾制的遗迹，欲写《中国图腾艺术史》。此事虽未行，却因对文化学、文化史及中国古代史著作的阅读，引发出对史前文艺与神话研究的兴趣。适逢中文系有人主持撰写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丛书，以人为题，确定了十位对象，将其中的闻一多研究交给我，我虽因读了俞兆平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而自感难以再作全新之论，却因对闻一多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神话、《诗经》的兴趣，而将论题扭转到对闻氏的古代文学研究作文化的观照，与赵晓岚合作，写成了《学者闻一多》。

与上述研究几乎同时，我又延续了对诗、画的研究兴趣。《有声画与无声诗》出版后，因感到西方是力图拉开诗与画的距离，而我国古代却着力于诗画的融合，可是，诗与画毕竟所属不同，艺术介质、手段有异，虽可比又不可比，为此而生分写《中国诗歌思想史》与《中国绘画思想史》之念。我以先生后熟为原则，先作后者，全书百万字，始于1994年，因有集体项目和教学任务，主要用暑假写作，耗时四年才完成，也同《有声画与无声诗》一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才在成稿三年多后出版。此时，已入新世纪，同事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已出多年，使我只能将另一选题调整为《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却因对能否出版的疑虑，令我不敢贸然动笔。而因2002年接受暨南大学之邀担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则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一写作计划终未能实施。近十年之后，出版拙著《中国绘画思想史》的贵州人民出版社要我自报选题，争取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而此时经历了一场大病，我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再写大部头著作。于是，我的诗画之学就只能终止于这种跛腿的状态了。

九十年代的十年，我的治学既延续了诗画之学而偏在绘画，又新辟了文化与文艺的宏观关系研究，还在学术史范畴以学者为对象继作“研究之研究”。以上三方向的成果，就是分别出版于2001年的《中国绘画思想史》，2003年的《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2001年的《学者闻一多》。三著的出版，在我六十岁左右，此时的辨识力已较前为高，虽非和

光同尘，却听到的多能泰然入耳，看到的也见怪不怪，虽无反潮流的勇气，却能不跟风而动，此或为我的“六十而耳顺”之义。

2002年底，为申报古代文学博士点及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我被借调到暨南大学，担任学科带头人，次年，前者得批，后者未就，我正式调入暨大。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宋代研究丛书》已出多种，或因我有《中国绘画思想史》之作，向我约写《宋代绘画研究》。成约于2002年6月，而因我的调动，应对多事，虽只用了半年多撰稿，成书却已在2004年8月，出版则是2006年10月了。我的学术兴趣屡转，虽不怕“学书不成学画，学画不成学塑”之讥，却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未在各界求取认同，故似只有词学界还将我看作“自己人”，因此而有回归词界之想。我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写了《宋词与人生》，又在该社出了《词学廿论》，在齐鲁书社再版了《唐宋词美学》，以维持先入为主的词学学者形象。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词的形式与艺术发展史”获批，为应对考核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后，我在2007年一年内完成了《唐宋词艺术发展史》的百万字书稿，三年后正式出版。

我曾有二十年的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史，自三十五岁重回大学以来，为追回岁月，就停止了锻炼，虽自感体能退化，却无明显的不适，为之还自我调侃：“青年时应是狮子老虎，老年时要像乌龟王八。”而实际上我不应提前进入“乌龟王八”状态，故从中年起已因久坐不动而疾病暗生。1999年，第一个验血指标高出临界，此后各指标逐年飘红，渐成“三高”人员，本应重启体育锻炼，却停不下高强度研究的脚步。因多年的连轴转，健康严重透支，终在2009年大病一场，躺上了手术台。此时，我才意识到体育锻炼确应是一生之事，对于运动员出身的人尤应如此。悔之晚矣，亡羊补牢，却已非其时！我只能停止了将要进行的研究，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不情愿地划上休止符。

从前曾流行过“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我的真正为学始于三十五岁，应工作到八十五岁，但因健康亮起红灯，身患多种疾病，我只能止于七十。这本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我虽不逾法度规矩，却受制于健康而不能从心所欲了。有了这一清醒认识，我只能中止原先计划，仅在出版《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后，于2011年再版了《中国绘画思想史》插图本，旋即开始整理三十多年的著作、论文，拟在七十周岁时出版自己的学术文集，就此将“换一种活法”，以度余生。这样，原先计划要写的几种著作都不能付之实施了。按先后，这些著作是：《进

士文化与唐诗》、《中国诗歌艺术思想史》、《中国韵文学概论》，以及力图构建新体系、体现“一代之所胜”的《中国文化史纲》，此外，还有一或两种词籍别集的校笺。

新著写作未成，旧作整理已就，如今，名之为《邓乔彬学术文集》的十二卷本将正式出版。十二卷文集分别是：

第一卷：《文化与文艺》，包括专著《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和相关论文七篇。

第二卷：《比较诗学》，包括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两个专题。前者是：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古代诗画比较论文一篇，中外比较诗学论文六篇。后者是：与陈学祖合作的影响比较研究书稿《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三章。

第三卷：《文化诗学》，包括四组论文：文化与诗，十二篇论文；进士文化与唐诗，十二篇论文；诗歌美学，十篇论文；曲学及其他，十一篇论文。

第四卷：专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上）》。

第五卷：专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下）》。

第六卷：《词学三著》，分别是《唐宋词美学》、《宋词与人生》、《爱国词人辛弃疾》。

第七卷：《词学论文集》，包括：词学总论，十三篇；词人词作论，十三篇；词论研究，十篇；其他，八篇。

第八卷：专著《中国绘画思想史（上）》。

第九卷：专著《中国绘画思想史（下）》。

第十卷：《宋画与画论》，包括《宋代绘画研究》及研究绘画与画论的论文六篇，访谈一篇。

第十一卷：《学者研究》，包括《吴梅研究》与《学者闻一多》二著，及论述二人学术成就或研究方法的论文二篇。

第十二卷：《杂缀集》，包括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六十种画论著作所写的提要，第二部分是九十二篇古文的提要，第三部分为序跋后记，第四部分为学习笔谈，第五部分为发言、讲座稿，第六部分为作品赏析。最后附有作者分年度的著作、论文、文章目录。

回顾七十年的人生，恰以1978年三十五周岁为界：此前是在中学、大学偏科、移易的“志于学”与不能“学”之十多年，学工、学农、学军的数年，不能给人以学、自己亦不能学的工厂子弟学校教师的七年；

此后则是真正在高校的为学、治学，经历了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命历程、节点。十多年的蹉跎岁月，即使放弃体育锻炼及诸般爱好，也难以追回！若老天能再给我以十多年的健康岁月，本应有逾千万的文字用于结集的，如今却只能止于古稀之年而仅得六百多万字。不过，人们常说，学问是做不完的，念此也就不必自责、自叹了。

本文集的出版，先得暨南大学第三期 211 工程经费的资助，所缺的大半费用由晨讯科技董事长杨文瑛女士赞助，在我筹款无门、不得已而向这位从无联系的初中同学求助时，立即就得到她的无条件应允，随即将钱款打入出版社账户。对此，实在是难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本文集的整理、出版，得我沪、穗两地历届的博士生、博士后助力甚多，分别负责各卷的整理、校核者是：

第一卷：刘兴晖、金国正

第二卷：陈学祖

第三卷：彭国忠

第四、五卷：刘兴晖、昌庆志

第六卷：吴思增、王毅

第七卷：杨柏岭、仲冬梅

九卷：李杰荣、刘兴晖、王嘉、陈建穰

第十卷：何平华、汪涤

第十一卷：李俊（委托刘晓亮）

第十二卷：程刚、夏令伟

文集能顺利出版，衷心感谢他们！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本文集列为重点图书，社领导统筹安排，诸位编辑兢兢业业，特此致谢！

围绕为学主题，回顾五十多年人生历程，权以为序。啰嗦之至，望读者谅之！

邓乔彬

2013 年 5 月 22 日

本卷提要

本卷收录《唐宋词艺术发展史》的后面部分。

第一章,南渡词及其因革变化。

靖康事变促使了南渡词之变,多表现真情,感慨悲凉。待到绍兴和议签订,高宗“中兴”局面形成,则有“复雅”之倡,供奉之作亦见。南渡名臣李纲、赵鼎等人所作,是“变风之时,小雅之才”的体现,向子諲“步趋苏堂”,张元幹从妩秀变为悲愤。朱敦儒为“三变”之一,其词本多尘外之想,风格清隽谐婉,南渡后忧时念乱而见悲凉壮慨,后期入以道释思想,多有名理禅机。此期最为当行本色的词人是李清照,她在南渡后虽未必全遵循自己的论词标准,但仍属词之正宗,以妍婉隽雅见长,既是闺阁中苏辛,具有“丈夫气”,又能独辟门径,成卓然名家。其他南渡词人尚有苏庠、周紫芝、陈与义、吕本中、徐俯、洪皓、蔡伸、李弥逊、王以宁等人。高宗、孝宗之交多颂谀词与大曲,南渡后期有范成大、杨万里等的诗人之词,朱淑贞则是优秀的女词人。

第二章,辛弃疾及辛派词。

陆游与张孝祥是稼轩风的前奏,前者兼有雅致与冶艳,呈半苏半秦的特点,根源于他的诗化与“诗余”观,又因多隐逸之作,人以之有道家风味;后者追踪苏轼,词多诗人句法,既骏发踔厉,又潇洒出尘。辛弃疾是出将入相的人物,以词为“陶写之具”,所作抚时感事,别立一宗,入以经子百家,体现了文化集成,因综融南北、兼具情志,成为了两宋最伟大的词人。稼轩以文为词,发不平之鸣,似韩愈的“气盛言宜”,有雄深雅健之概;又抒忧娱悲、解嘲谐谑。立屈骚之旨,承“美人香草”传统,分有以物比人、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君臣之词,兼有慷慨纵横与温婉悲凉风格,具多样风貌。陈亮与刘过是稼轩之羽翼,陈亮词感慨淋漓,有纵横家之风,又因比兴而见幽秀疏宕之风;刘过词多壮语,兼有狂逸与俊致,得稼轩之豪放,而未得其宛转。后期辛派有戴复古和刘克庄,后者“拳拳君国,志在有为”,词旨正而有感情,善作比兴寄托。

第三章,风雅词派及其艺术独创。

风雅词派形成文化基础是:江浙地区的“民物康阜”,士人追求寄兴适情,才子崇尚晋人风雅,因地狭人稠,为官不易,造成了江湖文化,以隐逸或游谒为生存方式。此派以姜夔的创作成就最高,姜夔尚雅乐而反胡乐,明俗乐而求之雅,自作先词后曲,回归于“声依永”原则,坚持主体抒情,改变了以词就曲的定法,其词“清空”、“骚雅”,前者得益于晚唐诗的风神与江西派的瘦硬,因于其为人的襟怀洒落,故所作不涉媚媚,境象空疏、遗貌得神;后者深得比兴之义,温柔敦厚,怨悱不乱。史达祖之词妥贴轻圆、辞情俱到,兼有瑰奇警迈与沉痛悲凉的风格。被喻为“七宝楼台”的吴文英词,貌雕绩满眼而潜气内转、运意深远,绵密曲折而善作“空际转身”,多使事运典、隽句艳

字,风格芬菲铿丽,善营仙思鬼境,被拟为词中的玉溪、长吉。其他可列入风雅派的词人还有赵长卿、张镃、高观国与卢祖皋等人。

第四章,宋季风雅词的艺术总结与辛派嗣响。

宋末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浙江词人群是风雅派的继续,以杨缵《作词五要》、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为代表,体现了系统的创作理论。周密是沟通此派前后期词人的领袖,宋亡前之词尽洗靡曼而独标清丽,宋亡后寄托遥深、比兴精切,因与众多词人深有切劘,故亦杂众长。咏物词家王沂孙所作多有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因借物言志,虽气清而妍和,却言近指远、赋情独深。张炎为白石后劲,词史上并称姜张,所作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兼有清丽圆转与清超壮阔之长,却稍逊沉厚。三大家之外,陈允平取法清真,所作清丽芊绵,余如李彭老、张枢、杨缵、施岳、仇远、唐珙,也有佳作。另外一群是被视作稼轩后劲的江西词派,其中刘辰翁词满心而发,以中锋达意,又不乏轻灵婉丽。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风骨甚高而语极苍秀,其他江西词人因受理学家影响,多有根于血性之词。宋季入元的词人中,蒋捷是难以归入流派的独行者,其词不乏托兴遥深之作,语多创获而兼有众长,是词中的诚斋体,又具有元曲风味。

本书后附有第四、五卷主要参考文献。

目 录

第一章 南渡词及其因革变化	1
第一节 南渡词之变	2
第二节 南渡名臣与张元幹	15
第三节 “三变”之一朱敦儒	33
第四节 当行本色的李清照	45
第五节 其他南渡词人	64
第六节 高、孝之交词坛	80
第二章 辛弃疾及辛派词	96
第一节 陆游:半苏半秦与道家风味	97
第二节 张孝祥与稼轩风前奏	110
第三节 文化集成与稼轩词	124
第四节 以文为词与韩愈之喻	138
第五节 屈骚之旨与比兴寄托	152
第六节 主体风格与多样风貌	169
第七节 陈亮、刘过及前期辛派词	185
第八节 刘克庄与后期辛派词	202
第三章 风雅词派及其艺术独创	223
第一节 风雅词派形成的文化基础	225
第二节 姜夔的音乐思想与创调原则	236
第三节 姜夔词的清空	246
第四节 姜夔词的骚雅	259
第五节 史达祖:分镳清真 平睨方回	270
第六节 七宝楼台 炫人眼目:一论吴文英	284
第七节 芬菲铿丽 玉溪长吉:二论吴文英	297
第八节 其他风雅派词人	307
第四章 宋季风雅词的艺术总结与辛派嗣响	322
第一节 浙江词人群的艺术创作论	323

第二节 宋季风雅派领袖周密	334
第三节 咏物词家王沂孙	347
第四节 白石后劲张炎	365
第五节 西湖吟社成员之词	378
第六节 稼轩后劲江西派	387
第七节 兼有众长的蒋捷	400
主要参考文献	410
后 记	413

第一章 南渡词及其因革变化

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帝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共一百五十三年。其中宋高宗统治三十六年,孝宗二十七年,光宗五年,宁宗三十年,理宗四十年,度宗十年,恭帝、端宗、帝昺皆短命王朝,共五年。高宗、孝宗、宁宗、理宗在位时期都很长,南宋的文艺发展,却不与各皇帝的执政期同步,而大体与宋金、宋元间的和战相关。

笔者认为,对南宋词应结合和战形势,及相关而形成的流派风格来划分。如此,则历史阶段并不明显,而流派的特点则为之凸显。因此,结合历史与流派,拟将南宋词分作四章来论述:第一,从靖康事变的北宋之亡,经南宋建立的初期,到宋高宗与金朝签订绍兴和议止,为战乱时期,是南宋词的第一阶段,可命名为“南渡词”。此期词重在历史,词亦反映社会史、心灵史,多为动乱生活的写照,社稷存亡的忧愤。高宗签订绍兴和议后,宋金二十年没有战争,南渡词渐变,成为下一高潮到来前的过渡阶段。第二,完颜亮南侵很快结束,随之是高宗退位,孝宗之立。孝宗“北伐”失败,隆兴和议签订,随之是四十年的和平期。经绍兴和议后二十年中“忧时”、“避世”、应制之词并行的过渡,到孝宗时期,因“恢复”难行,壮志被抑,以辛弃疾为代表,创作出一批相关之词,形成了以愤激悲凉为主体风格的流派。第三,与辛弃疾同时而又稍后,主要在孝宗、宁宗时期,和平日久,文艺发达,词坛形成了追求典雅精工的艺术风尚,继承、发展、变化周邦彦的艺术手段,出现了以布衣词人为创作主体,以姜夔为代表的“风雅”词派(又称格律词派)。第四,风雅词派从理宗时期延续到南宋末,以浙江词人为主,以杭州为创作中心,继续在推敲声律、钻研法度中发展,将词推到了“精能”之极致;而在宋元之交,此派词人目睹国亡,身丁离乱,引起了词风之变,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同时,以江西词人为主,稼轩一派为之延续,虽亦亡国之音,却为“悲而愤”之作。

本章所要论述的南渡词坛,其历史基础实际上包含两个时间段:一是宋室南渡时期,二是南宋初期,即宋高宗与金朝签订绍兴和议之前。从靖康二年(1127)四月的徽钦二帝被掳北,北宋亡,到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和议签订,两个时间点之间共计十四年半稍多。而南渡词则不能作如此的机械划分,还应分别向两端延伸。北宋后期词人甚众,而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南渡词人来论述,当取决于其创作。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要生活在北宋时期,但创作期跨越北、南宋,且大体相等;一种是创作主要在南渡之后,或其作品的影响主要产生在南渡以后。因此,南渡词实际上包括部分的北宋词,是跨越北、南宋时期的创作,而非全为南宋之作。

从签订第二次绍兴和议,到金海陵王完颜亮以政变登上皇位,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发动第三次宋金战争,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之间,有了二十年的和平。高宗朝廷偏安一隅,恢复和发展经济,社会较为安定,逐渐造就出“中兴”的局面。这一

阶段可作为后南渡时期,一并列入本章论述。

在靖康事变中,不仅政权被颠覆,宋人引以为自豪的、高度发达的文化,惨遭落后民族的暴力蹂躏,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遭到很大破坏,从上到下都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从感情到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也影响到文艺创作。对于词来说,此期的创作主潮也确实是与时而变:因国变家亡,自难继续浅斟低唱、花前月下的传统,也无法推敲字面、钻研声律,使词既突破了狭义的“缘情”,又难顾其倚声而唱的性质,使得被大晟词人所规范过的词风,不期然而然地向苏轼的“以诗为词”转化。女词人李清照一弃其《词论》中确立的标准,南渡后所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以“四名臣”和张元幹为代表的愤慨词,还是被《碧鸡漫志》称为“佳处亦各如其诗”^①的陈与义、吕本中、朱敦儒等人,都因事因时而发,为词提供了新质。而在南渡后期,随着和平的到来,宋高宗驻蹕临安,在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同时,也逐渐着手礼乐建设。高宗赵构“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馀,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②,但“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馀言”^③,与乃父相似,也喜好书画文艺,亦有作词之长。于是,很快就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供奉词人群,所作或延柳永之风,或学大晟词人。

南渡词因时势而变,艺术上也先“革”而后“因”,承上启下,在宋词的由北转南过程中,是重要的过渡时期。

第一节 南渡词之变

靖康事变似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

宋徽宗早在崇宁元年(1102),就命童贯置苏、杭二州制作局,专门从事金银、象牙、犀角、玉器、雕刻、织绣、竹藤、装裱等工艺,工匠有数千人之多。三年多后,为扩建皇宫、兴修苑囿,再命朱勔在苏州领苏杭应奉局,江浙官民家中能观赏的木石为之一空,运粮的纲船,民用的商船,都被用作运花石,十船一纲,称为花石纲。政和元年(1111),又以杨戩、李彦主“西城括田所”事,大肆掠夺民田,人民不堪其害。花石纲和括公田分别引发了方腊、宋江起义,宋徽宗不得已而下罪己诏,撤除应奉局。而待到起义被平息,立即恢复这些搜刮机构,宋徽宗写《艮岳记》,以庆延福宫和艮岳建成,“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④。他沉迷于书画、音乐和蹴鞠,自以为可以长作风流天子。而蔡京、王黼、童贯、杨戩、朱勔等,则公开卖官鬻爵,以至民间流传“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⑤之说。

宋徽宗高兴没多久,国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宋廷君臣一味享受之时,

① 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卷二,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4页。(版本后同)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三二《高宗本纪》,《二十五史》,中华书局版,第5255页。(版本后同)

③ 脱脱等:《宋史》卷二四《高宗本纪》,《二十五史》,中华书局版,第5235页。(版本后同)

④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〇六,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630页。

⑤ 朱弁:《曲洧旧闻》卷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7页。(版本后同)